

菜贱伤农”拷问执政 “媚富病”

本报评论员

近期,全国各地蔬菜价格普遍下跌。在山东、江浙、上海一带,卷心菜、大白菜的价格甚至跌破农民种菜的成本,由此引发菜农自杀或菜贩大量毁弃蔬菜等悲情事件。

对此,商务部前天紧急部署对策,稳定蔬菜市场,帮菜农寻找销路。其中包括组织指导大型连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企业直接采购蔬菜,优先销售滞销蔬菜。

又见“多收了三五斗”,又见政府有关部门“亡羊补牢”。面对这两类本质上是“旧闻”的新闻时,任何有识之士都难免扼腕长叹!此番“菜贱伤农”的原因何在?简要分析一下,便可归纳出“气候异常变化”、“菜农跟风种植对赌市场供求失散”、“物流环节猫腻太多”、“小农经营模式不能抵御市场风险”、“日本核辐射恐慌抑制蔬菜需求”等因素。其中,除了“日本核辐射恐慌抑制蔬菜需求”这一特殊的偶发因素外,其他几项都是司空见惯的老面孔,盘坐在“菜贱伤农”解释席位上已有多年。正所谓“有其因必有其果”,固有的原因既然年年如是,相应的结果自然是一次次从“再来”。

这次大范围的“菜贱伤农”事件,发生在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山东、江浙、上海等地,连这些地区的菜农都在

变幻难测的市场面前不堪一击,其他地区的菜农的生存状况则可想而知。尤为悲剧的竟是,一方面是菜农手头的卷心菜低到每斤0.1元出售,甚至烂在田间地头无人收购,一方面是城市居民面对每斤1.5元的卷心菜直呼太贵而舍不得买,而处在收购与销售终端之间的一些菜贩,也因为不堪卷心菜积压之苦,将几百斤库存卷心菜碾碎并扔到水沟。

面对这种多败俱伤的结果,菜农和菜贩固然需要反省,但是最需要反省的是政府。菜农的经营模式为何依旧如此分散?从菜地到菜市场,物流成本为何如此之高?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收储政策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在蔬菜生产——流通——销售这一流程上是否履行了疏通经脉之责?

应该说,针对此次“菜贱伤农”事件,商务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望发挥积极作用。但问题是这些平时就可以采取的措施,为什么要等到恶性事件发生时才紧急出手?这种危机公关式的动员手段,为何不能未雨绸缪地落实为日常的制度?

去年,“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联袂登台,将农产品市场搅得异常火爆,其时蔬菜价格也搭车涨价,让广大消费者叫苦不迭。不过,从媒体调查的情况看,众多菜农从此次农

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的好处并不多,蔬菜涨价的绝大部分收益,被雁过拔毛的物流环节和菜市场租赁主管部门集体瓜分。此次蔬菜涨价带来的有限增收,激发了菜农们对今年蔬菜的种植热情,导致蔬菜种植面积大增,结果市场给了菜农们当头一棒:菜农去年的收益,远远抵不上今年的亏损。这种菜贵菜贱都伤民现象,已经在我国轮回发生了多次,它不仅挫伤了菜农的积极性,也暴露了政府施政方针的顽疾:对农业的扶持与改良,政府更多的是停留在喊口号和做表面文章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国企改革攻坚战捷报频传,资本市场发展日新月异,房地产行业富豪云集、高科技产业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然而,在农业领域,改革开放收获的成绩单却显得不够亮丽,小农经营模式的普遍存在、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等现象就是明证,屡屡上演的“菜贱伤农”事件,更是为此类明证增添了悲情的注解。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为何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行业、高科技产业受惠良多,而戴着“小农经济”帽子的农业却相对被冷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政府有关部门染上了“媚富病”,把绝大多数精力和财力用在那些见效快、来钱猛的行业和人群上。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各级地方政府大兴围地运动,蚕食城市周边的农田菜地,将菜农驱逐到异地

他乡,甚至迫使农民更换职业,另谋生路。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打着城市化的幌子向开发商献媚,却无一例外地降低了城市本地的蔬菜自给率,人为地拉长了蔬菜的供应链条,加大了蔬菜的物流成本,其结果是种菜的菜农和买菜的市民都利益受损。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考量,将寸土寸金的有限的城市土地用于房地产或CBD区开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做出这种决策的时候,往往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都想建CBD区,而不愿承接其他城市的农业转移,结果是繁华的高楼你有我有全都有,蔬菜供应你难我难他也难。比拼媚富和崇拜GDP(国内生产总值)后果就是,菜篮子工程的重要性被无限虚化,推动农业集约经营、帮菜农寻找销路这些在政府看来带有献爱心色彩的工作,更是容易被抛诸脑后。

中国政府从来不缺解决问题的智慧,但时常有选择性地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对于菜贵菜贱都伤民的问题,政府只要真正从民生着眼,从长远发展考量,就一定能够标本兼治。从国家此前公布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十二五规划以及商务部刚刚出台的稳产蔬菜市场的应急措施中,已然可以找到根治菜贵菜贱都伤民这一难题的良方。关键在于,政府必须下定决心,拿执政媚富病开刀!苟如是,不仅是菜农之幸,也是民生之幸、国家之幸!

给食品添加剂套上紧箍咒

罗瑞明

为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饲料、水产养殖中使用违禁药物,卫生部、农业部等部门根据风险监测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更新非法使用物质名单,至今已公布151种食品和饲料中非法添加名单,包括47种可能在食品中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22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和82种“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和畜禽水产养殖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物质”的名单。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禁止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这类非法添加行为性质恶劣,对群众身体健康危害大,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依照法律要受到刑事追究,造成严重后果的,直至判处死刑。

最近曝光的食品问题有不少,从“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猪肉,到“牛肉膏”、“毒豆芽”等等,其中不少是利用添加剂来“增彩添味”。要说添加剂并非毒药,大都是正规厂家生产,正牌正照,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添加剂犹如味精鸡精,只要按照合理的量进行使用,就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合理的量是多少?有谁说得清楚?

量是一个变数,在一定程度上是良性,但是超量却变为恶性,谁都知道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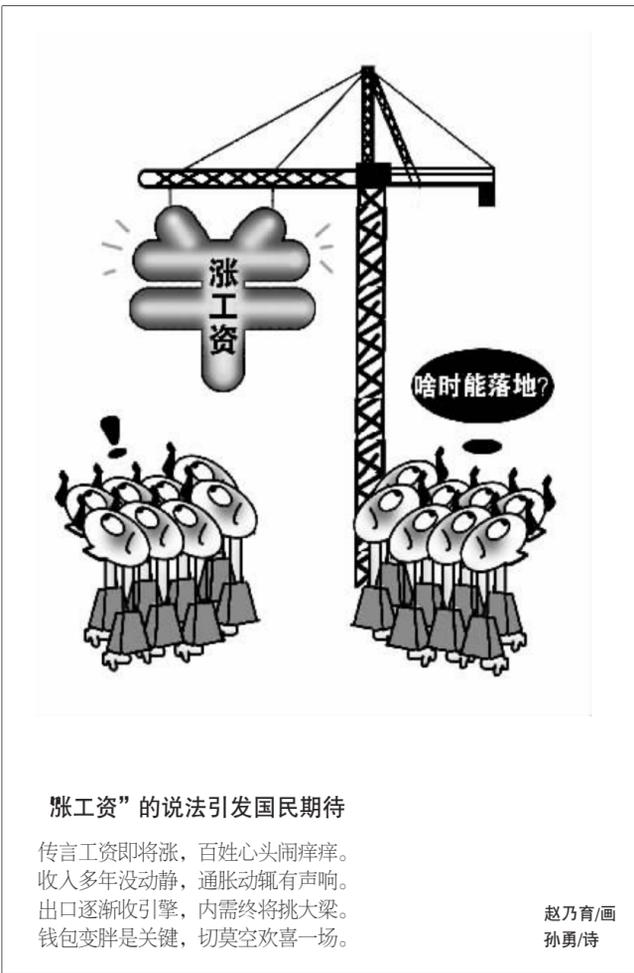
好的东西都得保持一定的量,即使是大米硬撑吃多了也不利,即使是再好的补品,如人参鹿茸过量了也非常有害,问题就出在量上。如果用量得当,就不会出现“化学食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食品,但是长期以来添加剂少见有用量标准。

添加剂没有量化,使用起来就无所顾忌,因而一些人在量上做文章,能用半两用一两,能用半斤用一两,涂上“牛肉膏”猪肉可以变为牛肉,用甜蜜素可以代替白糖,用柠檬黄的着色剂可以生产出玉米面馒头,等等,添加剂成了食品“由此变彼”的道具。

食品超量用添加剂短期内并无多大反应,只能是慢性中毒,由此消费者短期内难发现,退一步说即使发现添加剂,其大多生产也是合法的,到哪儿去说理,到哪儿去投诉?只能是默默地承受潜移默化的损伤,而食品监管部门即使要进行监管,也难入手,这添加剂是多是少拿什么去判断?除非是影响大、反应非常强烈的事件,才会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食品添加剂在市场上随处可见,随处可买,你能卖,他就能买,而问题出现后,卖者却毫无关,这就造成源头属于合理合法,而下游却是违纪违法,即使再堵也难堵得住,问题食品即使被查处也难断其根。

因而,治理问题食品除了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行为之外,还得源头入手,把住入口关,哪些食品能用添加剂,哪些食品不能用,用多少才合适,都得有个准则。制定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国家标准,给“食品添加剂”套上紧箍咒,无疑是源头堵住滥用添加剂的良策。



赵乃育/画 孙勇/诗

经济时评 | Hot Topic |

减税是工资倍增的唯一路径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开始了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许多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真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让劳动者的收入在未来几年内倍增,唯一可行的就是,必须让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缩小,以扩大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这就需要全面地、连续地、大幅度地减税。

陈东海

近日有关部门的官员声称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力争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倍增。关于工资或者是收入倍增计划的东西,前些年就沸沸扬扬了,但是没有看到有意义的进展。

新老工资或收入倍增计划的东西,之所以从来只闻打雷不见下雨,是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倍增计划的令人信服的、可以实现的路线图,也就是没有可供实现的途径。从现有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别说是普通人的收入倍增,实际收入可能还会有下降风险。

劳动报酬占比持续长期下降

如果真要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全社会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倍增,实际上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全方位地、连续地、大规模地减税。

根据2010年某机构的调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许多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有某官员介绍2006年至2010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如果按期计价计算,年均增长16.6%,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高于GDP增速。

在GDP的几个主要构成成分中,劳动者工资收入所占的份额逐年明显下降,而资本收入部分所占的比例上升,同时财政收入所占部分稳稳地超过30%。这些构成GDP的几个成分,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数倍于GDP的增速,同时资本很强势,劳动者很弱势,那么如何能保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增速连续数年的保持超过GDP的增速?按照之前的格局,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会越来越被挤压。所以,如果真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让劳动者的收入在未来几年内倍增,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劳动者收入在GDP所占的份额连续地逐年扩大。而这样做,GDP中其他成分所占的比例必须逐渐缩小才成。所以,必须让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缩小,以扩大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这就需要全面地、连续地、大幅度地减税。

未来几年,中国GDP的增速可能放缓,那么如果要保持职工工资收入倍增的话,那么就需要保持职工工资收入15%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将会两倍于GDP的增速。但是如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在20%-30%之间,必然让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受到制约。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强势因素导致的,相比之下,职工工资收入增长就显得非常弱势,所以如果没有全面的、连续的、大幅度的减税,让工资收入增长连续数年保持在15%是难以实现的。

不全面减税难以普遍提高收入

从微观上看,不实现全面的减税,实际上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倍增计划必将永远流于口号。从普通人所在的各种就业单位和职业来看,自谋职业者面临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和利润被吞噬的风险,普遍性提高收入非常困难。那些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其企业老板的利润和收入在目前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难以有提高的空间,根本就没有财力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更别提连续数年保持高增长以倍增了。对那些在竞争性行业与企业来说,产品销售竞争异常激烈,同时生产投入的物价指数也在不断走高,经营普遍非常困难,普遍性的在数年内实现就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倍增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全方位的降低几乎所有环节的企业和个人生产经营者们的税收,让它们有能力去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

从一些税收的改革思路来看,也无法让普通职工的收入在数年内倍增。就在这次刚刚被一审否决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部门在数年间社会广泛的呼吁之下,才准备将个税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个税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那些受益最大的人群,每月少交的税也才350元。目前的生活成本,早已让每月3000元-5000元收入的人谋生非常困难,但是每月少交的税还不到150元。靠这种办法来实现普通人的工资收入的倍增,是没有希望的。而其税率设计中,月入1.9万以上就开始要增税,而这个收入水平,在目前的一线城市,也就是一个小康的水准,远谈不上富裕,也是需要工资收入倍增的人群,可是却面临加税的困境。

因此说,在目前的GDP的分配格局中,没有全面的减税,那么未来数年的职工工资收入倍增计划没有实现的基础,也没有可操作的路径。同时,对于个税的小打小闹蜻蜓点水式的改革,对于职工工资收入的提高,也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所以,如果未来数年来要实现职工工资收入的倍增,唯一的实现途径就是全面地、大规模地、连续地减税。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

欧洲债务危机风险尚难掀起大波澜

胡月晓

伴随时间推移,各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断增强,危机期间的超宽松状态自然要被终止。然而,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还远未完成,债台高筑的欧洲二线国家的财务状况也未见改善。在欧洲央行释放加息信号后,市场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因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的不良后果忧虑急剧上升,国际评级机构再度下调了一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主权债务危机重演风险再度上升。

然而在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确认、国际金融体系流动性充盈状态持续的情况下,欧洲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并不会引起债务危机重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难以重起波澜。主要的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宏观经济环境不同。与1年前不同,当前全球经济复苏

的基础更加牢固了。虽然欧洲二线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频起波澜,但欧洲的经济前景仍然令人乐观,复苏步伐未有改变。2009年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初现端倪时,世界各国经济正在努力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各国经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依靠货币刺激的需求能否激发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市场还心中无数。当时市场普遍认为,2009年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补库存”,库存回补行为结束后,随着货币扩张的短期刺激效应逐渐消除,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存疑。

其次,国际金融环境改善。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央行“大放水”,金融体系领域的流动性迅速恢复了危机前水平。但是,直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初首度爆发时,欧、美的影子金融市场

却仍未恢复。随着金融创新和衍生交易的发展,金融“影子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影子”信贷市场(欧洲常又称为“平行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要大于传统金融市场。“影子”金融市场,对发达国家金融系统流动性的维持,起了很重要作用。美国金融救助的许多重要措施,就是专门针对“影子”信贷市场的。经过2010年的努力,欧洲等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已逐渐复原,金融机构盈利大幅增长。影子金融市场状况也得到改善,表明当前的国际金融环境与1年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首度爆发之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当前危机风险重上升的基础是政治,而非经济、金融基本面再度恶化。欧元区体系决策程序虚增了危机风险。由于欧元并不是一个主权货币,因此欧洲中央银行(ECB)为达成一项货币政策的程序或时间,往往比美联储要长。即使当前欧洲二线国家面临债务到期无法偿还的

风险上升,耗时费力的决策程序通常导致救助协议不能及时达成。决策程序上的缓慢和不确定性,对当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加深起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ECB通常不能如市场预期的及时达成救助协议。4月初,由于ECB没有如市场预期地及时达成协议,未能如外界预期那样公布旨在援助爱尔兰的新流动性根据计划,惠誉和标普同时调低了对爱尔兰债务的信用评级;希腊、葡萄牙等国也因有关机构未能按时常预期达成债务重组或救助协议,被国际评级机构降级,从而导致市场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上升的忧虑。

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上,决策纠纷通常会引来一些临时的波动风险,这些风险看似严重,但并不具趋势性。4月初,美国政府因预算协议无法达成,还面临了关门的危险。而政府关门,在美国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就因预算问题关门数月,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